

拥抱至死

乔叶/作品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身份共同体
70后作家大系



山东文艺出版社

我一直认为，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最慢的是活着，最慢的也是写作，最慢的是在活着时写作，最慢的也应该是在写作中活着。

拥抱至死

乔叶 作品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拥抱至死

学术策划与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拥抱至死 / 乔叶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5.3
(身份共同体 · 70 后作家大系 /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ISBN 978-7-5329-4725-6

I . ① 拥… II . ① 乔… III . ① 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7824 号

拥抱至死

乔 叶 作品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5 插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725-6
定 价 40.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70后”的身份之“迷”与文学处境

孟繁华 张清华

当我们决心要把一群“70后”作家装入一个笼子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件难事。因为这些人的创作确乎很难从总体上做出涵盖与评价。除了年龄相近，他们在文学上几乎再没有更多共同之处。

这恐怕与这代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有关。总体上，比较而言，“60后”与“50后”作家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线或差异，因为他们都有着接近的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至于“80后”作家，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集体记忆”，他们出生时社会已经开始剧变，走向差异与破碎了。而“70后”这一代，刚好处在历史的夹缝之间——对于历史，他们的印象是若隐若无似是而非；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风暴雨式的文学革命与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当他们登上文坛的时候，80年代的文学革命已经落幕了；面对现实，“80后”又横空出世，遭遇网络文学大行其道，没有历史负担的这代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70后”就夹在这两代人之间，他们只能另辟蹊径展现他们的文学才能。因此，这一代的小说可以说一直游移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游移于个体的叙事与公共的记忆之间。

当然，这样的分析或许只是一孔之见。事实上，“70后”作家们用他们的方式仍然创作了许多新鲜而独特的各式小说。当总体性溃败之

后，用“代际”概念来表达创作的差异性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文学批评就是这样，虽然是临时性的概念，但要试图对之进行有效阐释时又不得不用之，而它的通约性也为我们提供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和可能。

或许这样表达不同代际作家的文化记忆或类型是合适的：“50后”、“60后”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大体相似的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体相似的历史经历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70后”如前所述，他们隐约或模糊的历史记忆难以形成明确的历史共同体，同时又不像“80后”那样没有任何历史负担。因此，他们只形成了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70后”作家曹寇说：“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①更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50后”、“60后”的“历史共同体”，“70后”的“身份共同体”还是“80后”的“情感共同体”，他们都是“被想象”的共同体。一方面，这一划分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这个合理性并

①见《曹寇谈70后作家：适逢其时的“中间代”》，《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30日。

没有被充分证实。王安忆曾经说：“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有人进了天国，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传统，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话，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所以，还是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让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青年能真正读我们的书长大。”^①如果是这样的话，“70后”的身份之“迷”完全是被杜撰出来的，现在的代际划分过二三十年后也将沦为子虚乌有。那时回头看现在，原来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白忙活。

然而另一方面，“70后”作家个体的独立或分散状态，也就是今日中国文学状态的缩影和写照。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统一的文学方向已不复存在。但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还要特殊一些，这就是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2009年诺奖获奖者赫塔·米勒说，她的写作是为了“拒绝遗忘”。类似的话还有许多作家说过，但是，这样正确的话对中国“70后”作家来说或许并不适用。普遍的看法也认为，“70后”是一个没有集体记忆的一代，是一个试图反叛但又没有反叛对象的一代。事实的确如此，当这一代人进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大变动——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与文学变革都已经成为过去。“文革”的终结、启蒙主义年代的终结，使中国社会生活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确立，使每个人都抛却了意义又深陷“关于意义的困惑”之中；同时，自80年代开始的“反叛”又日甚一日地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后，“反叛”的神话在疲惫和焦虑中无处告别，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论“反叛”的执行者是谁，可以肯

^①王安忆：《在同一时代之中》，见中国作家网，2013年9月24日。

定的是，这一切都与70年代无关或关系不大。这的确是一种宿命。于是，70年代便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与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们看来，虽然很难对这代作家做出整体性的概括，但他们也确乎没有形成一代人文学的“同质化”倾向。换言之，他们生成了另一种难得的丰富性——他们之间是如此不同，除了一个“身份共同体”以外几乎很难找到他们之间任何两个人的相似性。正是这种不同，使他们在历史缝隙中的突围成为了可能。于是，我们在世纪之交或者新世纪以来，便看到了由魏微、戴来、朱文颖、金仁顺、乔叶、李师江、徐则臣、鲁敏、盛可以、计文君、付秀莹、冯唐、瓦当、路内、曹寇、慕容雪村、梁鸿、李修文、安妮宝贝、哲贵、阿乙、张楚、李浩、石一枫、李云雷、东君、黄咏梅、娜或、朱山坡……这样一群人构成的“70后”小说家的主力群体。

关于“70后”作家的特征，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三位很早即发表过对话《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十几年前他们就发现了这一代人“被遮蔽”的现象，比如他们完全在“商业炒作”的视野之外，还有部分作家所负载的“白领”意识形态对大众的鼓惑诱导等等。但现在看来，之所以会有这些看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50后”这代作家形成的“隐形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压抑和遮蔽。“‘70年代人’中的一些女作家对现代都市中带有病态特征的生活的书写，不能不说具有真实的依托。问题不在于她们写的真实程度如何，而在于她们所持的态度。应该说1998年前后她们的作品是有精神指向的，并不是简单的认同和沉迷，或者说是某种批判立场的。”这些看法确乎是有远见的，上一代作家在文坛建构起的统治地位和主流形象，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持续压抑和遮蔽了后来者，他们被早已形成的经典化秩序规定了自

己的身份与姿态——“你是一个年轻的、生于70年代的作家，你就是‘新新人类’，否则你就什么都不是。”这一描述道出了“70后”的身份之“迷”和精神的困窘。

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70后”仍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显示了他们令人不可忽略的文学地位。假如要让我们举出例证，那么例证是不胜枚举的。

魏微——她的中、短篇小说，因其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独特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高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魏微取得的成就与她的小说天分有关，更与她艺术的自觉有关——她很少重复自己的写作，对自己艺术的变化总是怀有高远的期待。盛可以，她一出现就显示了不同凡响的语言姿态，她语言的锋芒和奇崛，如列兵临阵刀戈毕现，她的长篇小说如《火宅》、《北妹》、《水乳》以及短篇小说《手术》等，都不是以触目惊心的故事见长，甚至也没有跌宕起伏刻意设置的情节或悬念，可以说，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她锐利如刀削般的语言。在她那里，“怎么写”永远大于“写什么”。李师江，他几乎纠正了现代小说建立的“大叙事”的传统，个人生活、私密生活和文人趣味等被他重新镶嵌于小说之中。李师江似乎也不关心小说的“西化”或“本土化”的问题，但当他信笔由缰挥洒自如的时候，他确实获得了一种自由的快感。于是，他的小说与现代生活和精神处境密切相关，他的小说也是传统的，那里流淌着一种中国式的文人气息。鲁敏，她的小说既写过去也写现在，既有虚构也有写实，关于“东坝”的叙述，已经成为她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这个虚构的所在，在今天已是只能想象而无从经验的了——就像当年的鲁镇、乌镇或其他类似的地方。现代化的进程决绝地剿灭了这些力不从心或没有抵抗能力的脆弱区域，那些渺小而令人心痛的生命。中国的小镇是一个奇异的存在，它在城乡交界处，是城乡的纽带，是过去中国的“市民社会”与乡绅文化存在的特殊空间。在那里，我们总会看到

一些奇异的人物或故事，这些人物或故事是带着与都市和乡村的某些差异来到我们面前的。张楚，他的小说的魅力，就在于难以一眼望穿的模糊。这是一个有巨大野心的小说家，他的作品难以用谱系的方式找到来路，他的小说有诸多元素：深受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受到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甚至受到《水浒传》以及其他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经过杂糅吸收和重新铺排，诞生了这个奇异的张楚。看来他是真的理解了小说，他的每篇作品，在生活的层面几乎都无可挑剔，生活的质感、细节和真实性几乎达到了“非虚构”的程度，但是整体来看，其虚构性甚至诗性又都一目了然。在亦真亦幻、真假难辨之间，张楚的小说像幽灵一般在我们眼前飘过。哲贵，这个擅长集中书写富人的存在与精神状况的作家也是一个特例。他所描写的这个阶层在中国是如此特殊——他们是一个“成功者”的阶层，是一个被普通人羡慕乃至仰望的成功人群，但这个人群无所归依、空虚空洞的内心世界，在哲贵的讲述中可谓令人有难以言喻的震惊。东君的小说写的似乎都是与当下没有多大关系的故事，或者说是无关宏旨漫不经心的故事。但是，就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暧昧模糊的故事中，他表达了对世俗世界无边欲望的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审判，而是在不急不躁的讲述中，将人物外部面相和内心世界逐一托出，在对比中表达了清浊与善恶。计文君，她的小说仿佛出自深宅大院：它典雅、端庄，举手投足仪态万方。因此她是一位带有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和气质的作家。另一方面，它诡异、繁复、俏丽，修辞叙事云卷云舒。她的小说有西方20世纪以来小说的诸多技法和元素，但是计文君却又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她是现代的。付秀莹，作为一位后来居上的新秀，起初很长一段时间，她只以孙犁式简约而又清丽的笔触书写她记忆中的乡村，乡村的锦绣年华风花雪月曾让她迷恋不已。近年来，她的创作视野也逐渐转移到了城市，但她仍然写得温婉而跳脱、节制而耐心。娜嘎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

接续了80年代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馈赠。作为潮流的现代主义虽然已成为了过去,但是,现代主义文学曾经揭示和呈现的关于人的惶惑、迷惘甚至反抗的精神状态和内心要求不仅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比80年代更加普遍和激烈。娜彧显然发现或感受到了这一精神现象的存在,因此,以极端化的方式表达这一精神现象,显然是娜彧刻意为之的。

.....

就在我们梳理“70后”创作成绩的时候,另外一种批评的声音也如期而至。青年批评家张莉认为“70后”小说家的创作,是“在逃脱处落网”。她认为:“70后作家创作遇到的困境,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瓶颈:从先锋写作、新历史主义到新写实主义、晚生代/新生代写作,中国文学已经被剥除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特质’,它逐渐面临沦为‘自己的园地’的危险。70后作家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近十年来的创作景观——如果我们了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强调‘祛魅’,即解除文化的神圣感、庄严感,使之世俗化、现实化、个人化,那么70后作家整体创作倾向于日常生活的描摹、人性的美好礼赞以及越来越喜欢讨论个人书写趣味则应该被视作一个文学时代到来的必然结果。”^①这一提醒并非惘然。整体看“70后”作家的创作,历史全面隐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切合了这代人的身份,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他们难以与历史建构关系的真实困境。

显然,如果从一般性的常识来看,“70后”作家的多样性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问题就在于他们迄今“经典化”程度的严重不尽如人意。到了应该“挑大梁”的年代,到了应该登堂入室的年纪,到了应该有普

^①张莉:《在逃脱处落网——论70后小说家的写作》,《扬子江评论》2010年1期。

遍代表性的时候，一切却几乎还在镜子里，是一个“愿景”。中国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50后”和“60后”的一帮中年作家。究其原因，在我们看来，当然有各种难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从内部讲，恐怕就是因为个人经验书写与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接洽问题。在现阶段，否认个人经验或者经验的个人性当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记录者，如果不自觉地将个体记忆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逻辑，与这些东西有内在的呼应与“神合”，恐怕是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的。

或许这与作家的“抱负”有关，也许他们会说，去你们的狗屁“抱负”吧，只不过是一些历史的幻想狂或自大狂的假象，我们就是要写局部、碎片、个人情境。那谁也没办法，但是我们想提及的一点就是，任何人想进入历史都得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如同当代法国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个人记忆是必须要有“社会框架”的，否则就会产生奇怪的失忆症。或许这代人过于无序的经验书写，也是某种社会与历史失忆症的表现吧。

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带着西方文学的影响和记忆开始了整体性的“后退”，这个“后退”就是向传统文学和文化寻找资源，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探索是在总体性瓦解之后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个人性。这也是“70后”作家整体风貌的一部分。“70后”隐约的历史记忆，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面对个人的心理现实——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但是，他们在矛盾、迷蒙和犹疑不决之间，却无意间形成了关于“70后”的文学与心路的轨迹。无论如何，这代作家的成就和问题，都是我们当下中国最典型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注视这代人文学实践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在关注当下的中国文学。

2014年2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一个下午的延伸	1
最后的爆米花	17
解决	35
家常话	59
遍地棉花	79
月牙泉	93
黄金时间	119
鲈鱼的理由	139
旦 角	155
拥抱至死	207
叶小灵病史	241
拾梦庄	293
在土耳其合唱	333

一个下午的延伸

到宣传部上班的第一天，我迟到了。

是因为鞋子。

其实我七点半就来到了县委大院，可是部里还没人，我就在办公大楼后面那所破败的花园里慢慢地转悠着，等着钟点。园里的花大多是易生易长的月季，萧条地抽枝疯长着，高高地擎着艳丽的花冠，仿佛柔弱得不堪一击，又仿佛孤傲得卓绝人世。这些巨大的花丛，多数已不开花，它们膨胀着无用的枝条，肆无忌惮地占据着花园的空间，猖狂得如人类某些难以节制却又盲目已极的欲望……我感慨着在青砖小路上踱着步，忽然发现自己再也迈不动左脚了。

低头一瞧，原来是鞋跟深嵌在了砖缝里。用力拔了两拔，鞋拔出来了，可鞋跟从砖缝中“脱颖而出”的同时也以一条漂亮而简洁的弧线飞离了鞋底。

我束手无策。

透过冬青树的枝叶往外望去，人们已经开始三三两两地上班了。但是没有人发现我，没有人从这条小路上走过。我张了张口，没能出声——我无法也不愿向那些陌生的远远流动的面孔求助。

我焦灼而沮丧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小路上终于走来一位中年

男人。我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犹豫着。他似乎发觉了我的神情，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鼓起了勇气。他平静地听我讲完，然后问道：“你的脚没事吧？”

“没事。”

他躬下身仔细察看了一下我的鞋子，说：“这得到外面鞋摊儿去修。你只好再委屈委屈，我去给你修一下。”

他从包里取出一张报纸铺到地上，让我把左脚踏在上面。

那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所破败的花园里，专心致志地等待着那个陌生的男人。焦灼和沮丧渐渐幻化成了一种恬淡的快慰。

他终于回来了。我穿上鞋子跟着他走出花园。从进办公大楼，上楼梯，转弯，直至将要走到宣传部办公室的门口，他都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在推开门的一刹那，他突然回头问道：“你找谁？”

“办公室主任。”

“有事吗？”

“我今天报到上班。”

“那你迟到了。”他笑道。

“你也迟到了。”我也笑着跟着说。

“我们迟到的性质不一样。”他说着迅即而自然地收敛了笑容，推开了门，把我向同事们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后，便带我去常委办公楼见部长。我这时才明白：他就是办公室主任。

我们慢慢地走在开满了紫桐花的林荫道上，所到之处都会激起一阵如洗的鸟鸣。忽然，一朵紫桐花优雅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把花拿在手里，抬头朝树上看了看，笑道：“紫花才谢尽，绿叶又争荣。看着你们一茬茬地赶上来，就觉得自己老了。”

那天我正好穿着一件浅紫色的裙子，便笑道：“你才是绿叶呢。我

是紫花。”

他看了看我，笑起来：“今天你干吗要走那条小路？”

“你呢？你不是也走了吗？”

“我是习惯了。”

“我是新鲜。”

他又笑起来。他笑的时候脸颊上有两个很大的酒窝，使他看起来像个孩子。

后来我被分到了新闻科。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少，也很公式化，平日里见面也只是点点头，打个简单的招呼。再后来他被提升为副部长，无形中便和一般的职员拉开了较大的距离。虽然他言谈举止在我看来一如既往，但同事们背后议论起他来，总说他阴险。我却觉得他阴险得十分有趣，便常常偷偷地观察他。

有一次，我正在悄悄地看他擦皮鞋，他忽然抬起头，对我轻轻一笑，然后又低下头擦他的鞋子。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在窥探他。我的脸红了。

然后就是那天下午。

那天下午，他到我们科询问“县十大新闻人物评选活动”的进展情况。科长不在，我负责候选人材料的收存工作。他让我拿出材料，大致看了一遍，特意把卫生口的材料选了出来。听同事们说，他原来是个医生，看来果然不假。

“这个人也当了候选人？”他笑道。

“材料上说两年就破格提了主治医师呢。”我说。

“主治医师怎么了？哪个医生不能成个主治医师？”

“那么容易吗？主治医师相当于教授呢。”

“谁告诉你的？”他笑了，“那是主任医师。”

“我不大懂。”我说。

他在我对面的桌前坐下，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起了医院的工资、职称、行政结构、人事关系等等这些他曾经十分熟悉的内容。我发现他是一个极好的谈手，非常有自己的角度和趣味。而这种角度和趣味又出乎意料地吻合我的心理习惯。于是我们一问一答，谈兴倍增，营造出的谈话气氛十分融洽、活泼和热烈。

当谈到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时，我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便对他说：

“我读过一篇叫《无影灯下》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医生在给背叛他的女友做阑尾炎手术时，故意破坏了她的生殖系统，结果这个女人婚后多年不孕，事情败露后医生被送进了大牢。不知道这个医生在做手术时是怎么想的？”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医生是医生，可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们所说的‘救死扶伤’、‘妙手回春’之类的评定都是死的硬的，可医生这个人却是活生生的。他是白衣天使，但也有魔鬼附身。当天使战胜魔鬼时，他就是天使；当魔鬼战胜天使时，他就是魔鬼。”他神态从容地说着，仿佛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一个手术，“你们说的那个医生也是如此。他做阑尾炎手术时，是天使；他破坏她的生殖系统时，是魔鬼。其实这种事情再正常不过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这两种东西在斗争。人们之所以会对某些事情感到困惑，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这些事情发生的内在因素罢了。”

“你对人性这么有研究，是不是看了许多哲学书？”

“有人就行了，何必非得看书？哲学无处不在。”

“没想到你悟性这么好，我原以为……”

“我不过是一个狡猾的政客，不是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却又蓦然一惊。我的笑等于默认了他的推测，这未免有点儿太危险了。

于是我试图亡羊补牢，说：“和你聊天我很放松，就像朋友一样。可如果我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你千万不要介意。”

“你不应当有这种顾虑的。”他含笑道，“以我们相互信任的程度来说，我们所负担的风险值是一样大的。”

我觉得自己在他面前简直是一览无余。好在一览无余和一无所知一样，都可以让人毫无顾忌，于是我索性笑道：“前些天我听说了一件事，有个男人，和你年龄差不多，半个月前和一个女人私奔了。我觉得挺有意思。你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冲击和诱惑似乎特别多，尤其是感情上的。”

“我说过，人们之所以会对某些事情感到困惑，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这些事情发生的内在因素罢了。这种事其实也很正常。我们这一代人一次次地建立信念、怀疑信念和摧毁信念，直至最后没有信念，心灵所经历的折磨也许是你难以忍受的。”他点燃了一根烟，“能够私奔，我其实挺佩服他的。要知道，以这种方式抛弃过去的一切，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他好像有点儿不太理智。”

“寻求感情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至少得丧失一半理智。”他笑道，“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理智细胞相当发达的人来说，为爱情做出些什么已经是相当困难了。”

这是个周末的下午，办公室里很静。一些同事早就偷偷地溜回了家，几乎没有什么人来打扰我们的谈话，除了电话铃声。每接一次电话我都会觉得害怕和尴尬，害怕的是他会突然走开，让我们这次在机关里很难出现的谈话不了了之；尴尬的是我们重新开始接上话茬儿时往往有点儿不自然。虽然我们很像朋友，但毕竟不是朋友。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下属，我们不能不互相设防。

但是他在我接了五个电话后依然没有露出要走的意思，我自如了许多。我忽然明白，他在机关里其实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谈手，他也需要松